

儿子病后自称杀人 母亲检举旧案新破

陶某的噩梦从那个晚上开始。1997年年底,陶某的弟弟陶福军带着陶某15岁的儿子时本强外出打鱼,鱼没打着,舅舅和外甥两个反而遭遇车祸,同时受伤。时本强受伤较为严重,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才痊愈。儿子病愈,父母欣喜不已。然而,让他们没想到的是,一场车祸把原先听话乖巧的儿子变成了另一个人……

“打鱼”摔伤脾气大变

1996年,21岁的陶福军,带着14岁的外甥时本强由拜泉县永勤乡丰盛村来到邻近的林甸县城,他们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部。不曾想,生意不景气,干了一年,连过新年的钱都没有挣到手。陶福军在沮丧之中产生了邪念:要去老家抢开卫生所和小卖店的陈凤春家。

1997年12月30日,陶福军带着时本强到附近的双阳河打鱼,鱼没打着,陶福军就带时本强到附近一家饭店吃晚饭。陶福军故意让本来不会喝酒的时本强喝了一大杯白酒。他见时本强有些醉意,便用摩托车驮着他回到了原来居住的丰盛村。当日21时,他们来到了陈凤春家。毫无防备的陈凤春给两人拿完药以后,陶福军回手就给了陈凤春一刀,并逼迫他往外拿钱,陈凤

春不拿,陶福军便气急败坏地让时本强用刀捅死他!时本强精神恍惚中胡乱地向陈凤春身上捅了30多刀。然后舅甥二人一起来到里屋,将躺在炕上睡觉的陈凤春的妻子、母亲和女儿一起捅死。他们抢走300多元现金和17条香烟后,逃之夭夭。

陶福军驮着时本强逃回林甸的途中,由于不胜酒力,时本强实在打不起精神,在摩托车上睡着了,陶福军听到外甥“啞咕”一声掉到地上,立马刹车。由于刹车太急,陶福军连车带人翻入沟内。他俩都受了伤,时本强伤势较重,昏迷不醒。

1997年12月31日8时许,警方接到丰盛村报案。经过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之后,确认陈凤春一家4口全部中刀死亡,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图财害命所致。然而,当地警方紧锣密鼓地工作了好长时间,也没有什么进展,案件始终处于僵局状态。

父亲大义灭亲检举儿子

陶福军和时本强在受伤后,被送入医院治疗。经过一年多的治疗,时本强于1999年1月15日,由齐齐哈尔返回拜泉老家静养。回家以后,时本强时常向父母要钱,不给就发火,有时还拿刀威胁老人。时本强出院后脾气变得如此暴躁,让父母一时无法理解……

当别人渐渐淡忘丰盛村的灭门案件时,时本强的父母

却始终在关注着这起灭门惨案的侦破。回想儿子的种种表现,他们觉得,儿子似乎和这个案子有重大关系。

时本强受伤3天后在医院苏醒时,和专程来侍候他的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咱村的陈凤春被杀了,是我干的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,他又昏死过去。待到第七天的时候,时本强又醒了过来,他的父母见状高兴得热泪盈眶。时本强一眼看到父亲盖着他沾有血迹的大衣,便急着说:“那上边都是陈凤春的血,恶毒人,你可别再盖了。”时本强的父亲下意识地把盖在身上的大衣拿了下來,并和老伴一起对儿子时本强受伤后的言语犯了心思。他们感到,自己一手培养教育出来的儿子,从来都很听话,很懂事。况且,他只有15岁呀,能干出杀人越货的勾当吗?他们怀疑儿子是摔坏了脑袋,胡乱说出来的。但是,后来看到他说“血衣”那种认真的表情和要吃要喝的头脑清醒程度,父母心中的疑虑又加重了。

一年多来,时本强的父母如坐针毡,心如刀绞,总是处于矛盾之中。最后,这两个本分的村民,正义战胜了私心,毅然做出了大义灭亲之举。时本强父亲的沉重步伐终于在1999年3月,迈进了拜泉县公安局的大门。

但是,时本强被抓进看守所以后,守口如瓶,只字不讲杀害陈凤春一家的事情。他说

他是无辜的,是冤枉的。而警方一时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,经过调查,还否定了他的作案时间,最后时本强被排除作案嫌疑,无罪放回了家。

这个结果,是时本强父母巴不得的,他们乐得大哭起来。

此后,时本强继续外出谋生。后来,他去了哈尔滨。

8年后儿子再次提起往事

2007年的中秋节快要到了,陶某去哈尔滨看望暂住在那里的儿子时本强。开始,时本强和女朋友都非常高兴,又买菜又买肉招呼母亲。可是,几杯酒下肚以后,时本强一本正经地对母亲说:“妈,你这次来,就别走了,好好陪陪我吧,我有预感,好像过不去今年,我就得离开你,因为老陈家的人是我舅舅杀的……”

听儿子时本强这么一说,陶某的头又昏昏沉沉起来。她含着眼泪认真地对儿子说:“孩子,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,不能随便乱说呀!再说了,公安部门不是已经调查过了吗,得出的结论是与你无关哪!”然而,时本强却不耐烦起来,大声对母亲嚷嚷着:“你唠叨啥呀,我干的事情,我自己还不知道吗?你别在这里瞎掺和了!”接着他就恢复了往日暴躁的情绪,对母亲大喊大叫。儿子的态度让母亲十分伤心,于是,她便由哈尔滨坐火车来到大庆的女儿家。陶某到大庆不久,时本强

也带着女朋友从哈尔滨来到大庆的姐姐家。时本强强硬地对母亲说:“我要1万元钱,要买面包车跑出租。”母亲对他说:“这么多年你花家里的钱还少吗?算起来,足有10多万元。花钱干点正事也行,你不务正业,净用钱打鸭子脑袋,家里不是银行!”听母亲这样说,时本强很生气,他在众人面前,把一碗饭泼到母亲的脸上。

这天晚上,母亲把时本强杀害陈家4口人的事对女儿说了。女儿惊呆了:“那可怎么办哪?”母亲既伤心又坚定:“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,那也没有什么办法,这种伤天害理的人,不能留着!”

9月26日下午,钱没要到手而不死心的时本强,在哈尔滨又给母亲陶某打来电话,声称:“如果不准备好一万元钱,我还会去找你。”当晚,陶某一宿没有人眠。陈凤春家三代4口人,又重现在她的脑海中,好端端的一个家,竟让自己生的孽种给毁了,这种由人变鬼的东西,还要他有什么用?她越想心里越发冷,如同掉进了冰窖一般……

在母亲的泪水中被捕

9月27日8时,陶某眼含热泪,两腿发软地迈进了大庆市萨尔图公安分局的大门。她在刑侦六队队长王建军面前,哭着说道:“10年前,我的儿子时本强把我们村老陈家一家4口都给杀了……”

队长王建军非常震惊。他马上向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朱为民作了汇报。按照朱副局长的意见,王建军组织侦查员分别与陶某及其女儿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谈话,并与拜泉县警方用电话进行了沟通。

9月27日11时,王建军带领几名民警赶到林甸县,经过3个多小时的蹲守,在菜市场将陶福军抓获。当天晚上,王建军他们又赶到哈尔滨市,将正准备睡觉的时本强抓获。

侦查员们不怕疲劳,连续作战,连夜对陶福军、时本强展开了强大的审讯攻势。一开始,陶福军还存在侥幸心理,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可是审讯人员稍微一提他的外甥时本强,他便身子发软,头冒虚汗。连续抽了两支烟以后,便缴械投降,如实地交代了他的罪行。

这时,时本强在另一间审讯室里,故伎重演,装疯卖傻,称自己脑袋摔坏了,对于当年的事情都不记得了。在对抗两个多小时以后,他终于招架不住,痛哭流涕地向侦查员交代说:“我这辈子纯粹是让我舅舅给毁了!”他说当年父母若不叫自己跟舅舅去学徒,他也不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之举。他说自从做出那种伤天害理之事以后,一看到七八岁的小女孩,心里就堵得慌……

听说儿子时本强被警察抓起来的消息,陶某顿时号啕大哭起来,不管女儿怎么劝,她都哭声不止…… 骆笔 云端

年轻导演顶住压力拍出《平原游击队》



郭振清在《平原游击队》中扮演的李向阳

长影厂于1955年底摄制完成的《平原游击队》,堪称新中国第一部抗战题材惊险电影。电影是在三幕七场话剧《游击队长》基础上改编而成的。该剧以1943年秋季侵华日军对我晋察冀边区发动的“扫荡”为背景,通过活跃在某县东庄以李向阳为首的一支游击队,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有力配合下,英勇机智地展开打击日寇及汉奸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经历,讴歌了冀中军民所创造的平原游击战的辉煌奇迹。剧本于1953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,时任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创的羽山,当即与邢野合作,着手将它搬上银幕。

作者不同意苏里当导演

《平原游击队》剧本报送文化部电影局审查很快获得通过,摄制任务于1955年1月正式下达给长影。厂里指派由年轻的苏里担任导演,剧作者得知后很不情愿,竟直接给苏里写了一封信,说:“这个剧本你搞不好,应该由汤晓丹来搞。”

此时正值《渡江侦察记》上映引起轰动,这是汤晓丹继与成荫联合导演《南征北战》之后拍摄的又一部广受瞩目、甚得好评的军事题材影片,而且在惊险样式的把握运用上更为纯熟与出色。相形之下,

苏里还属电影导演中默默无闻的“小字辈”,此前仅在《保卫胜利果实》《六号门》《祖国的花朵》中担任过副导演。苏里将信送给电影局主管艺术创作的副局长陈荒煤,很快就得到明确的答复:“就你搞,不要管他。”

后来拍出的影片所取得的成功结果,颇令剧作者始料不及,尤其是对导演由于熟悉与理解作品所反映的斗争生活实际,在再创造过程中精益求精更臻完善,不得不心悦诚服。

导演改戏作者叫好

剧中“李向阳县城脱险”

重场戏,剧本是这样写的:李向阳化装混进敌占县城,与汉奸杨守业相遇,敌酋松井正责令其限期捉住神出鬼没的李向阳,杨守业喜不自胜却又怕李向阳枪法厉害,抓不到反而被他摆倒,打算尾随到有利地方再下手。李向阳发现汉奸特务跟踪,便与小郭跳上一辆正要开动的大卡车,对司机冒充是特务队的;司机初时赶他们下车,接着听见后面枪声和捉拿李向阳的喊声,反而帮助李向阳逃走。卡车在县城街道上奔驰,特务们紧跟追赶,日本鬼子的摩托也出动了。卡车开到城墙脚下,李向阳叫司机刹住车,与小郭跳下藏在附近,待两个骑摩托的日本鬼子赶到进行搜索时,冷不防开枪把他们打死,然后再和司机分手撤退。

拍摄时导演对这场戏认真做了研究,认为剧本这样处理是想造成紧张气氛,描写李向阳大胆机警,而又深得敌占区人民的爱戴,但仔细琢磨漏洞很多:李向阳和小郭势单力薄,遇见汉奸特务时跳上一辆目标很大的卡车,不仅不够机智,简直是笨拙,因为城里到处是敌人,卡车又不便掩藏,却很容易被截住,岂不自投罗网?后来卡车开到城墙根,又打死两个鬼子再脱身,实际可能性很小,就显得更加不真实了,对李向阳英雄形象实际是有损的。于是果断删掉以上追逃场面,改为与杨守业遭遇并被发现后,李向阳马上抽身混入赶集的人群,待到杨守业等紧追过来时,市民们故意拥挤在一起,将特务们挡住,李向阳与小郭趁机脱身。

两相比较,剧作者由衷表示:“这样处理比原来我们写的既简练又合理,而且更充分地表现了群众对李向阳的爱戴。我们原先要浪费许多笔墨

才能达到而且不那么理想的意图,导演巧妙地用一两个镜头便解决问题,优劣之分,显而易见。”

影片送审时还曾发生一个插曲:当片子放到游击队员侯大章等进到城内,在一家小饭馆里教训汉奸狗腿子时,前排一个人大声说:“这是什么戏?太虚假!怎么可能呢?”坐在后面的苏里猛然站起来大声回应:“怎么可能,我当年就是这样干的!”那人没料到竟会有人这样大胆反驳,气呼呼地站起来拂袖而去。

电影局的一位负责人忙过来说:“苏里同志,你太厉害了,不能这样……”苏里仍理直气壮地说:“是他太厉害了。”但这场戏后来并未要求作修改,而且全片顺利通过了审查。

“李向阳”原是售票员

饰演李向阳的郭振清,原是天津电车公司一名售票员,因喜爱业余文艺活动转为专业从事舞台表演艺术,1952年应吕班之邀,在《六号门》中首演主角胡二而走上银幕,他浓眉大眼、棱角分明的形象与真挚朴实、自然贴切的表演,给武兆堤留下颇深印象,在筹备拍摄《平原游击队》时便力荐他担任李向阳这一角色。当第一次看到剧本时,郭振清不禁被李向阳的英雄行为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深为吸引,但因生长于城市,他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,对农民出身的游击队长李向阳这样的英雄人物很陌生,因而曾觉得有些不大可信,觉得一个二十多岁的人,真能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?随着访问抗日战士,听取他们对于武工队机智勇敢英勇开敌的事迹介绍,特别是前往冉庄体验生活,亲自接触曾领导该村开展地道战

的民兵队长王振禄,他当时也仅有二十多岁,郭振清由此逐渐理解和把握了人物的思想、情感。

认识升华促使手脚放开,郭振清倾心尽力投入角色创造,为之付出了不少代价。在体验生活时,武兆堤发现郭振清只要一打枪,就习惯性地闭上一只眼睛闭上,这与要塑造的富于传奇色彩的“双枪李向阳”英雄形象反差太大,当即坚决要求他纠正。对没有军旅生活经历的郭振清这是个不小难题,好在离体验生活处不远的地方就是部队的驻地,他便一次到那里练习打枪。武兆堤亲自陪同督促,从手枪、步枪直到机关枪,待到数千发空弹打下来后,打枪闭眼的习惯终于改掉。

按照剧情安排,影片开端是李向阳火速赶往司令部接受紧急任务,穿越堵在途中必经之路烧杀抢掠的日本兵,其手握双枪、策马疾驰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敌人的枪林弹雨,这是李向阳的首次亮相,也是展示人物一往无前气概和敏捷果断英姿的重要铺垫,拍摄的难度自然也就相当大,要求演员掌握一定骑马技术,具有和剧中人一样勇猛顽强的精神风貌。而郭振清从来没有骑过马,更不用说骑着快马飞奔在高山悬崖。但为了刻画角色需要,他下决心苦练骑马。刚开始与马接近,他还很担心被踢着,几次下来胆子才渐渐大起来,终于跳上马背猛抽一鞭,立刻飞奔向前。他伏在马背上只听到耳边呼呼风声,突然头一晕手一松,人从马背上摔下来几丈远,好在没有受伤,就从地上爬起来,继续上马再练。就这样练了摔、摔了练,有时被摔得昏迷不醒,醒来后咬咬牙照样再练。经过整整一个月的锻炼,郭振

清掌握了骑马的本领,得以通过仅仅几个镜头短暂场面的拍摄,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。

方化两次扮演松井

扮演松井对于方化而言,可谓“轻车熟路”了,因为他早已与这类角色结下不解之缘,曾在《松花江上》《哈尔滨之夜》《飞红巾》《赵一曼》中扮演过日本特务、日本兵。

尽管对于扮演日本鬼子,方化已有比较丰富的经验,但对松井角色的创造并未掉以轻心。他充分利用自己在伪满统治下的东北长大,对日本军官这类人物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,从亲身感受到的日本教师粗暴打骂和见过的日军残忍行为中,寻找大量的塑造角色的素材,对照剧本的有关描写,为人物撰写了详尽细致的小传。

他像以往一样亲自设计角色的脸型和化妆,确定为“铁青色的脸,像饿鹰一样的眼睛,眼睛里布满血丝,总想有一种吃人的可怕神情”,并特意买来一只老鹰和一只老猴子,每天仔细观察它们的举止,尤其是注意捕捉它们攫取食物时的眼神变化,运用到松井的形象塑造之中。他甚至重新温习小时学过的日语单词,校正自己的发音。拍摄中,他更是精心设计每一个表情与动作,如出场时随手弹拨着曼陀林琴,看似漫不经心地悠闲逍遥,但一抬眼便显露猎鹰般的锐利、狐狸般的阴险。

松井没有被迫简单化为愚蠢、残忍的反面符号,而是成为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,此后很长时期银幕上出现的日军军官形象都难以逾越,以至于1974年重拍彩色版《平原游击队》,演员全部“大换班”,唯有松井还得由方化“梅开二度”。 朱安平